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与展望

——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

本刊记者 杨 婷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岁时节日文化、传统礼仪文化。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引了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以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国民俗学成就斐然。随着国家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多学科交叉研究、互相渗透，学科影响力逐渐扩大。新时代中国民俗学继续

夯实自身学科地位，践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精神，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乡风文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中国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新时代民俗学发展已开启新的篇章？过去40年中国民俗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推动作用？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

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

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俗学在中国的大发展带来了活力，有人说，民俗学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对此，您怎么看？

萧放：民俗学研究的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日常生活文化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不同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兴起之前，我们民俗学科有很好的研究和积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自身有一个发展的脉络，最早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保护，后来发展到对民俗保护再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部分：(1) 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2) 民俗活动、仪式礼仪、节日庆典；(3) 传统表演艺术；(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 传统的手工艺和经验；当然还要特别重视与上述表达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中大部分是和民俗学有关系的。中国民俗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民族民间文化。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社会提出的重大课题已经在最近十几年成为国际上最受关注的文化议题，中国学者（尤其是民俗学者）的参与和学术贡献受人瞩目。民俗学界一方面努力把自己原有的关于民俗或民间文化的成就整合进来，另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以前的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民俗学研究的相当部分的对象和内容纳入新的国家或者国际研究的潮流，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的概念包含了民俗学研究相当部分的对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者大部分都是由民俗学者转变而来的，因为民俗学者本来研究的内容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合的，所以非遗保护兴起之后，这些人自然而然就成了非遗研究的主力

和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人员。所以说，民俗学借着非遗保护这一国际事业与国家工程，让自己的学科得到了一个提升与拓展，这是钟敬文先生生前所处的时代所没有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民俗学社会认知度较低，甚至有的大学教授都不知道民俗学这个词。现在非遗保护兴起之后，民俗学成了热门词，家喻户晓，这与国家非遗保护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很大关系，非遗保护工作的确让民俗学获得了直接服务国家与人民文化的重要机会，也为自身赢得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民俗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产出了很多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民俗学以前主要是学术研究，是民众文化的研究，有了非遗保护工作之后，民俗研究与国家的文化治理发生了关系，而且直接参与到国家社会的文化遗产与文化建设的主体工作、保护工作中来，比如参加国家、省级非遗名录的审查、参加各级非遗传承人的认定，以及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定与评估等，民俗学者在非遗工作过程中，地位显著提升，知名度更高，发挥了重要学术保障作用。我们民俗学者应该是非遗运动的行动者与实践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与分析者。这也是大量民俗学者直接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主要原因。

社会治理：1978年秋天是民俗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钟敬文先生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民俗学重启学术研究的新篇，从此，民俗学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鲜明记录了中国40年来的社会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新时代的今天，请您谈谈我国民俗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所面临的机遇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萧放：民俗学科是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的，古代讲风俗和民俗，但是没有民俗学这个学科。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才有了比

较明确的民俗学的概念，也出现了有重要影响力的民俗学者，比如顾颉刚先生、钟敬文先生、江绍原先生，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民俗学研究分了几个方向，有解放区的口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的采风采录，以及国统区一些学者所做的人类学的相关的调查。1949年之后，相关学者延续了延安时期的学术传统，继续关注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那个时候是不讲民俗学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秋天，是民俗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钟敬文先生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亲自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联名，递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科。1979年，公开呼吁启动民俗学科的正名工作。直到1983年，才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钟先生当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主任，到处奔走，为学科复兴和学科重建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钟先生承担了教育部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利用编写教材的机会，将全国几十个高校的教师召集起来组成一个班，这其中，有些教师在“文革”以前受过民间文学的训练，像乌丙安先生、张紫晨先生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生；还有一些教师来自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专业。大家一边编教材一边培训，实际上就是师资培训和编写教材同步进行。这个班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民俗学科的发展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现在已经退休了，大都七八十岁了，他们在全国高校的民间文学学科中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遍及武汉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师大、辽宁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等。后来，钟先生觉得民间文学局限了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后，连续办了很多期民俗学的高级研修班，1983年第一期高级研修班请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来授课，包括白寿彝先生、杨堃先生、费孝通先生等，这些

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后来成为了民俗学的骨干。钟先生是在1953年开始招研究生的，当时招收的专业是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直到1979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民俗学硕士，1981年列入第一批博士学位点，1988年，民俗学入选国家级重点学科。1992年，钟先生开始启动《民俗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全国30多所高校的老师参加了教材的编写，有一大批人在编写过程中快速成长。当时我在北师大作访问学者，也有幸参加了教材的编写。《民俗学概论》教材1997年审定，于1998年出版，出版之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8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的代表大会上，钟先生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这是一个宣言式的报告，也是他对中国民俗学界的一个期许，即我们不走西方民俗学的路，我们要走自己的中国道路。2000年，我帮助钟先生申请了中国民俗史的国家课题。中国民俗学派要建立，就必须要有有一个历史根基，就必须梳理中国的民俗学史。申请获批后，钟先生组织了两次讨论会以及作者队伍，形成了编写大纲，但是未及开始写作，2002年初，钟老去世，之后我们继续推进，这套6卷本、400多万字、上千张图片的《中国民俗史》在2006年国家课题结项后，终于在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文库。这是第一部系统的民俗学通史，它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2010年）、高等学校人文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各个节点都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推动作用，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的理事长，在每一次大会上，他都会提出推进性的意见，引导着学科的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非遗保护工作兴起，这是民俗学发展的又一次机遇。包括传统节日的复兴和传承工作，传统节日遗产化，让传统节日回归社会等，都是民俗学参与文化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也承担了文化部节日仪式类非遗传承人研培班的工作，成

为非遗传承的行动者。我们把非遗研培与乡村调查结合起来，研培时间分为两段，前半段由民俗传承人来到大学，学习“远处”的知识：政府政策、国际公约与典型经验。后半段由民俗研究者走入乡村，学习“当地”的知识，并且以深描的方式倾听、记录和抽象这些知识，使之变得可交流与可反思。更重要的是，通过互相学习所激发出来的问题，成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我们讨论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问题，是民众关心的而不是我们想象的问题，“就事论事”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我们研培的对象不仅有政府认定的“传承人”，还有地方节日仪式的组织者（政府官员）与传播者（学校教师、地方文化工作者等）。我们的目标，旨在提供传承人与学者专家、非遗工作者在同一个群体中进行学习研究和交流对话的机会，使三者共同关注、研讨和解决社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共同聚焦的、长时间的、深入坦诚的对话与交流，本身就能形成非遗传承的有效社区，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非遗传承的自发性动力。而经由民俗学学者的中介作用，非遗研培班不是一次性结束的“培训班”，它更是长期存在的、基于地方性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促进对话与协商的公共领域，我们事实上与乡村建设者通过现代微信群的常态联系与定期参与具体活动调研的方式，保持了一种新型的动态的实践面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让民俗学重新聚焦村民的生活，去对乡村的现状作调查，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强调乡村传统是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的。

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从文学院调整到社会学院，有人认为它表明民俗学从偏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对此您怎么看？这样的调整对于民俗学科的发展有何影响？2017年启动的北师大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是否也意味着

新时代民俗学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是1996年划归到社会学科的，但还在文学院。到2015年，学校作一级学科的归并和调整，把民俗学划分到了新成立的社会学院。按理来说，民俗学应该是独立的一级学科。因为民俗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是个整体，既有人文性，也有社会科学性，人文性是我们讲的口头传统和信仰，社会科学性是研究民间组织，研究基层社会的问题，民俗学所研究的内容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是两者的结合。社会学通常讲究管理，讲究外在对社会的控制及社会运行的研究，民俗学恰恰重视人的内在精神性的理解。一个是控制，一个是理解，理解的东西可以帮助有效地治理，治理其实就是要调动多元主体，多元主体的内在因素是什么，要去研究它，以前社会学不太注重这方面，比如扶贫问题，首先它是个社会问题，但仅有社会研究还不够，扶贫很重要是对贫困文化的研究，扶贫要扶志。另一方面，民俗学研究要学习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的理论，在民俗学调查过程中要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统计方法，民俗学以前更重视深度访谈法，就是面对面的访谈，这样可以真正了解人的心性问题以及内在精神的呈现，社会学可以帮助民俗学做更精确、更量化、更科学的研究，把握研究对象。2017年，依托北师大交叉项目平台，民俗学专业展开“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这为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范式的探讨与转换提供了重要契机。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的项目平台中，我们集合了哲学、礼仪、宗教、技术、文化遗产、农业经济、量化统计、环境政策、公共管理、非政府组织等许多不同方向的学者，我们关注的话题从民俗学传统的乡规民约，到非遗保护中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张力，再到地震后乡村重建过程等多个领域，每年四到五次的

项目组内部会议，提供给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相互对话与沟通的机会，以真正践行“日常生活文化的整体研究”。我们的研究生甚至我们高年级本科生都在田野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让他们真正了解社会现实，在科研中成长，也让我们民俗学在社会学院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未来，民俗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更清晰。乡村社会治理是我们传统的研究，但社会治理恰恰是社会的，那乡村社会治理调查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民俗学者更擅长研究的是对社会治理中的传统文化和文化资源利用问题，社会治理的根本也是文化治理，如果没有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就治理不好，它很软性，但是很有力，我们常常忽视这个问题，只讲经济指标。文化是“根”和“魂”，我们去追“根”和找“魂”，重建乡村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以前可能是文本研究、理论研究、概念研究、民间文学故事类型研究，或者说我们一直在上面“高打”，没有真正的“落地”。通过乡村调查，我们“落地”，真正实际参与。“落地”不仅关注它有什么，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帮助别人参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立足中国社会治理智库这一平台，以乡村调研为手段，走在民间、倾听乡村、咨政建言，促进多元社会主体的形成与建立，促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促进全社会的共建共治与共享。9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主办的“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成功召开。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等全国20多所著名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50余位民俗学教学科研骨干参与本次会议研讨。这次研讨会以“实践”作为关键词，是源于新时代民俗学面临重大转型的迫切要求。为继承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者的学术遗产，回顾与总结中国民俗学科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与学术成果，探讨新时代民俗学的发展机遇和未来方向，推动民俗学科的理论提升、服务乡村社会治理，会议围绕“民俗学的实践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召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会议，也是我们秉承钟先生的传统，在每一个关键点上开会。2001年，钟老还在的时候，开过一次学科建设会，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开了一次学科建设会。民俗学正处在一个面向实践的发展时期，从以前的理论探讨到现在的实践探讨，都要求我们到现场与所研究的对象互动，只有如此，我们的学科才有生命力，才能使学科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

社会治理：2018年8月17日召开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9次学术大会。本次学术大会是以“丝路民俗中的宝卷与甘州古乐传承”为主题，以此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与发展，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的副会长，您认为中国民俗学研究在国际社会民俗学研究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国际社会民俗学研究对于中国民俗学发展有何重要的意义？

萧放：国际学术界有很多民俗学理论，我们在工作中也注意学习和了解西方的理论，包括实践民俗学、表演理论、民族志、小群体面对面的艺术交流等等。与国外的社会实践相比，我们的民俗学研究的广度和生动性更胜一筹。我们的从业人员，我们的研究队伍、学科发展、博硕士培养情况，以及我们的出版物都是在世界上领先的。日本现在的民俗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美国的民俗学发展也趋向平缓；德国改成了经验文化学，不叫民俗学了；只有中国的民俗学一枝独秀。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是韩国注册的，它的法人代表在韩国，因为这个学会的会长是轮流制，现在轮到陶立璠老师

任会长，我是副会长。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在亚洲民俗学界交流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很活跃，我们也有经济条件，因此，国际亚细亚民俗学学术大会数次在中国召开。第15次学术大会是2014年在湖北孝感举办的，这是一次学术盛会，参会的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代表，之后还出了论文集《重阳与亚洲孝道文化》。此外，中国的学者每年还积极参与美国民俗学会的专题讨论。我参加过至少4次美国民俗学会的年会，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情况，他们对我们所介绍的中国非遗保护工作非常关注。中国学者和日本民俗学会也有定期的讨论。中国民俗学会还曾是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审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我们学习到西方民俗学界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理念。比如动力学，美国人类学有动力学的研究，我们借过来可以做民俗动力学的研究，研究民俗变化的动力在哪里，怎么变化，如何推动等。再比如欧洲的实践社会学，我们会研究把它运用于实践民俗学时怎么实现转换。西方的实践强调的是哲学性的、理念性的人的关怀问题。我们实践民俗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再仅仅是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主要强调通过对文化现象去关心那些承载文化的主体，对人的关怀。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一些理念学习过来，为我所用。

社会治理：2017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实施，您作为参与者，能否谈谈这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与40年前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文化工程有着怎样的关联？这对于中国社会治理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萧放：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诸分会组织人力抢救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故事、歌谣等民间文化，出版了十

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原本国家的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内容里没有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这三套集成，但是钟敬文先生通过争取把这三套集成列入其中。这是民俗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参与国家文化保存的重要工作。80年代启动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搜集编写文化工程，是基于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变化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是一个文化保存的重要工作。当时，党和国家，通过政府的项目形式分配到基层，整个社会有一批文化工作者为此做了几十亿字的收集整理，并且出了县卷本、省卷本。当时这项工程被称作是“文化长城”，的确做得非常好，使得很多珍贵历史资料得以保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宣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五大工程之一。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把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或者产品重新去整理出版，建立数据库使之得以完整保存。同时还要出普及版，要向社会传播。因此，这次更重要的是出版和传播，而上次更重要的是记录和保存。现在记录和保存的条件已经变化了，但我们也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记录和保存的工作，比如说出现的一些新东西把它丰富进来，上次遗漏的东西可以补充下来，主要是在既有基础上做好梳理和出版的工作。我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专家组组长。前面三套集成里面没有谜语，只有谚语，这是对三套集成的补充。这次十类里面多了俗语，谜语，把神话抽出单列，所以我们的工作更多是一个补充的工作。这两次文化工程的侧重点不同，但同样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需求，也是在全球化时代所进行的思考，即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去树立文化自信，怎么去做文化保存，怎么做文化遗产的工作。这对民族文化建设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举措。

(责任编辑：王大鹏)